

从曾荫权卸任后暂住深圳看避嫌制度

今年7月,曾荫权将从香港特区政府行政长官任上退休。作为特首,曾荫权常处于舆论漩涡的中央。最近,有报道质疑曾荫权曾接受富商款待,乘坐私家游艇前往澳门。有人质疑他此举是为了退休后退入商界铺路。曾荫权向媒体澄清了此事,并为了表示自己将真正“退且休”,而不是“退而不休”,他透露退休后将住在深圳短暂居住。

2005年,有着38年公务员生涯的曾荫权接替提前退休的董建华,成为香港第二个特首。董建华任内,关于特首退休后的有关规定才刚刚提上议程,直到董建华退休前数月,有关规范特首退休的规定才达成共识。但根据法不溯及既往的原则,为避免此规定被认为是针对董建华及继任的曾荫权“量身定做”的,这个规定于2007年第三任特首任期才开始生效。

曾荫权正是从第三任特首任上退休的,因此是这个规定的首个适用对象。根据规定,前任行政长官离任后三年是俗称的“冷河期”,将受到就业规范。在第一年,前任行政长官不能从事任何工作或参与商业活动。在随后的两年,在展开任何工作或从事商业活动之前,退休特首须事先征询一个咨询委员会的意见。三年后才能获得再就业的完全自由。但是退休特首在“冷河期”可以接受中央或特区政府的委任,或者自行从事学术或慈善机构的工作。

虽然董建华任上尚未对特首退休做出任何规定,但是董建华退休后的生活也与此规定相符。他退休后兼任的两个职位分别是接受中央委任的全国政协副主席,以及担任慈善机构“中华健康快车基金会”的理事长。

2008年的香港房屋署署长梁展文退休后违规再就业的事件引爆了香港公众对高官再就业禁制制度的关注。梁虽然已经过了“冷河期”,但是他所在公司曾在梁担任公职期间以低价获得了一个地块。公众因此怀疑梁在任职期间就已经利用公职为退休后再就业铺好了路。

此次曾荫权在退休前备受公众质疑,估计是公众担心再次发生类似的梁展文事件。因此香港对特首离任后的规定实际上比其他很多地区严格。包括英国、美国、澳洲、加拿大、日本在内的主要国家,对政府首脑离任后的政治活动均无任何限制,他们享有普通国民一样的政治权利。这些国家对官员退休后进行商业活动主要采取的是事后审查的制度,而不是事先一律禁止的规划办法。值得注意的是,政治活动和商业活动的不同标准。因为政治活动、学术和慈善等机构具有公共性,与官员未退休前的权力性质相符,所以这些领域欢迎退休官员继续发挥余热。而商业活动则可能渗入官员离职前的公职行为,导致公职受到资本腐化,且商业领域主要是私人利益,并不符合公共性要求。

对退休高官的诸多限制所反映的并不是不近人情的政治伦理,而恰恰代表了政治进步的方向。现代政治将政府职位从依附于个人的传统权力中分离出来,强调的是政治的公共性。影响官员权力运用的非公共性因素不仅可能存在于官员任内,也可能在任内预支权力,待到离任后再收取“延后报酬”。对官员退休后的工作进行管制就代表着对政治公共性的强调。而官员退休后,如能自动避嫌,则不啻为一种政治美德。 叶竹盛

公开怎能一再不了了之

上周,北京市民刘巍“较上了真”,他向北京市政公交“一卡通”公司邮寄了一封《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要求公开IC卡成本明细及巨额押金利息去向。“一卡通”每张押金20元,已发行4000万张,8亿元押金到底流向何处?刘巍的追问被媒体报道后,迅速升温成热点话题。

无独有偶,打假人方舟子上周也陷入了“公开门”。与他有关的“科技打假人士人身安全保障资金”和“科技打假资金”累计接受捐款近百万元,但没有公布详细支出明细,也没有明确说法。

仔细分析,这两件事均由个人“发难”,之后引起媒体或微博网友广泛关注,知情人士提供更多消息,于是将事件推向更加公开的境地。在公民权利意识日渐觉醒的时代,这种追问的广泛参与,给公开主体带来巨大压力,也给扩大信息公开带来可能。

然而,这种公开具有特殊性,比如,“一卡通”信息公开背后是4000多万张卡片主人,因涉及面广才备受瞩目,方舟子为知名人士而更受关注。但反过来想想,如果公开内容不是万众瞩目呢?如果公开主体为公众人物呢?可以想象,依赖“秋菊上访式”的非法要求公开,通过微博和媒体呼吁公开,终究只是“非典型”的手段,不可持续。

不可持续的公开,其效果势必不甚了了。“一卡通”即为一例。一张卡20元的押金,利息微乎其微,但4000多万张卡积少成多,数字就“蔚为壮观”了。更何况,如果这些巨额押金,被挪用于各种高回报投资,收益会更加惊人,而这部分收益,从不公开,成为监管灰色地带。因此有人说,利益被“卡”住,道理也就不“通”了。事实上,对这样“道理不通”的利益问题,在2006年北京“一卡通”实行之初,就有媒体呼吁公开明细,也曾成为热门话题,但最后结果不了了之。就公开“一卡通”押金使用情况,北京市政协委员石向阳曾六次提案,遗憾的是六度未果。

现在,“一卡通”押金疑云仍在弥漫,笼罩其间的不只是多次要求公开的市民,还有“隔岸观火”的监管部门。“一卡通”收取押金,不独北京存在。全国各大城市加起来,绝对是一笔天文数字。“一卡通”公司一直三缄其口,其底气何在?有关部门为何面对公众质疑置若罔闻,其背后隐藏着怎样的黑色利益链条?不免让人浮想联翩。无论从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有关规定来说,还是从保障消费者权益角度来说,“一卡通”押金使用明细都必须公开。如果一次次公民质询信息公开事件都变成新闻“烂尾楼”,那么损害的不仅是某些部门的公信力,更将为城市治理画上挥之不去的阴影。 肖潇

医患关系再也“伤不起”

3月23日,哈尔滨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患者持刀行凶,致一死三伤。遇害的实习医生刚刚接到香港一大学的博士录取通知书……

舆论一片唏嘘。骂行凶者丧心病狂者有之,叹医生没有沟通技巧、不谙患者心理者有之,怨医生已成低收入高风险职业者有之,盼医生有尊严地活着者有之,忧未来病无所医者亦有之……甚至竟有零星的叫好声,让行医者更添痛楚,身心受伤。

尽管我们大力提倡医患和谐,但医患冲突在近年来依然时有发生,医患关系紧张的忧虑依然挥之不去。“医者父母心”,中国传统曾受人尊敬、并与人伦至尊父母相提并论的职业,屡屡因冲突事件受伤,令人深思。

其实,不管在哪个国家,总有病重不治者、铤而走险者,也总有缺乏沟通技巧的医者,医患冲突何以在今天令人震惊?这次哈尔滨被杀的医生,和凶手并

无直接接触,受伤的医生在替谁挨刀?

经济高速发展的中国,在社会保障事业方面积累了不少欠账,而“教育”和“医疗”就是被拖累的两个大户。今年,我们终于有望实现一个承诺近20年的目标——教育投入占GDP的4%。然而,政府医疗卫生的财政投入也是一个长期低迷、至今仍未引起重视的指标。2011年,我国政府的医疗卫生支出仅占GDP的1.35%,低于世界上绝大部分国家。而发达国家的政府卫生支出占GDP比例一般为6%-8%,发展中国家大部分是2%-6%。

投入偏低,造成医疗保障水平偏低,城乡与东西部医疗资源配置失衡,医药不分家带来的“以药养医”、大处方等乱象,医药市场监管不力带来的医托作祟、假药横行……这一切恰与国民物质生活的日渐富裕形成反差。百姓在温饱之后,健康长寿的欲望激增,求医问药时却殚精竭虑。人命关天,一些非

理性患者便将怨气宣泄到了一线临床医生头上。

医务工作者的道德水准绝不会低于社会平均水平,相反大多数都是医者仁心。对13亿人而言,这是接触最多、依赖最深、受益最大的职业之一。绝大多数医生护士,都在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地支撑着13亿人的健康大业,为了治病救人,他们拿着低工资,“白加黑”地工作,承受着超乎常人想象的心理压力,以及被一些无良同行倒出的、泼向这个职业的污泥浊水,甚至还得挨上虽然个别、却令人痛心的无妄之刀,承受直接伤害。

医生和患者,本该是同一战壕的战友,携手迎击共同的敌人——疾病。处于对立的极,只会两败俱伤。因此,请将手术刀对准制度之弊,请像提升教育投入一样,为提升医疗投入而呼吁努力。这,才是让医生不再挨刀的治本之策。

李泓冰

官员醉驾被查叫嚣断公安局网络

据《京华时报》报道,湖北省通城县广播电视台副局长徐某醉驾无牌轿车回家,被当地民警查获,徐某指使人停掉了警用步话机,还扬言开除处警民警女儿。目前,徐某因涉嫌危害公共安全罪被刑拘。

近日,有网帖称,12日晚,通城县广电局副局长徐某醉酒后用假驾驶证驾驶机动车,被县公安局巡逻大队查处。徐副局长说:“我又没轧死人,干吗扣我?你们敢扣我,我马上停掉你们公安局的网络。”随后他通知广电局将公安局网络停掉,还扬言要将处置的公安干警金某在通城广电网络公司(从广电局分出来的)工作的女儿开除,性质相当恶劣。不少网友发帖,指责徐某的嚣张和霸道,希望相关部门公正处理。

据知情人士称,徐某被处理时指着处警民警金某大骂,还说自己与公检法很熟。得知金某通过步话机通知同事前来扣车扣人时,徐某打电话通知停掉了警方的步话机。其间,他还推搡殴打金某。最后,支援民警赶来,将徐某制服。

该县县委宣传部通报称,12日晚8时多,徐某在该县农业局开会后,陪客人吃完饭,自驾车回家,驾车行至距离单位约200米处,车子发生故障熄火了。恰在此时,一辆巡逻警车路过,巡警下车“帮忙”,发现车子无牌,且徐某满口酒气,遂扣车扣人。后经酒精检测,徐某血液酒精含量240mg/ml(80mg/ml为醉驾)。

【点评】醉酒驾驶,本来就不是什么好事儿。也有天不怕地不怕,明明犯事了还不低调的。这一点上,徐副局长的确霸气四射。霸气何来?徐副局长是广电系统领导,真把他惹急了,停掉公安网络、开除属下职工也是“力所能及”的。而地方县乡恰恰又是一个熟人社会,分管广播事业的徐副局长,也有机会与公检法“很熟”。但“能归能”,“熟归熟”,法治社会又岂容这样的醉官嚣张跋扈?徐副局长们,该清醒了! 漫画/朱慧卿 点评/张玉珂



油价为什么会遭遇逢涨必骂

针对日趋高涨的油价,嘉兴电视台记者走上街头随机采访百姓对油价的看法,对此众说不一。一些人表示更应节俭约能源,另一些人表示油价上涨承受不了,其中一名男子显得很气愤,反问记者:可以说脏话吗,如果不能,就没话好说了。(3月24日《南方日报》)

在成品油的生产成本高企不下的时代,油价上涨也许真是有必要的。不过,当下常见的涨快跌慢、涨得突然、涨得迅猛、涨得人无处可逃,以及涨价机制缺乏透明度之类,却又一直令人们颇有微词。

一般人面对着电视机的镜头还是

很克制的,即便心里有想法甚至承受不了,大多仍要学乖作理性。那位男子,对着镜头竟敢一反常态反问记者,这在不论是在我们讲究表面礼仪的时代,还是在讲究洁癖的电视画面上都是十分罕见的,我的理解,这恐怕是公民在忍无可忍之下真性情的自然流露吧。

油价上涨为什么会遭遇逢涨必骂呢?很显然一是因为油价上涨具有蝴蝶效应,可能意味着整个物价链条的全线上涨。二是油价直接关乎国计民生,开车的、坐车的似乎只要是人就难以幸免了。

最重要还在于,成品油的生产与销售,在我国都是垄断国企在玩。不过,近年来,相关垄断企业除了自身利润丰厚、员工工资福利越来越令人眼红之类的优势外,国民看得更多的就是与此相伴生的异常频繁的油价上涨。

不透明的垄断国企经营业绩,不透明的油价上涨机制,最后在涨价之际赢得人们产生骂骂或者想骂的冲动,终是难免的。骂本身并非坏事,这回涨价涨到人们竟想对着镜头开骂,甚至于拥趸者众,但愿对有关方面能有所助益。 采桑子

举家外逃何以如此轻松

农业银行江阴要塞支行行长孙锋,与妻子、父母、两个子女举家“出游”泰国后,便“失踪”了。由此,一桩涉及非法集资金额高达2亿元的银行行长举家外逃案,在“沉寂”了两个多月后浮出水面。

作为一家银行行长的孙锋,举家外逃竟是如此轻松。而妻子却在两个多月后才浮出水面,这样的出逃是多么成功啊!他们在境外,有充足的时间把赃款安全转移,然后销声匿迹。

孙锋举家出逃,与江西鄱阳财政局经济建设股股长李华波的举家出逃是如此相似。他们都是春节前借旅游之名出逃,一个说去海南过年,一个是去

泰国旅游;李华波是带着老婆和两个女儿,孙锋不仅带上了老婆和女儿、儿子,而且连父母也带走了;李华波在出逃之前把自己的别墅悄然转手,卖了80万元,而孙锋则是把私宅作了抵押;外逃的目的地也相同,都是加拿大。

无论是李华波也好,还是孙锋也好,他们的成功外逃,都说明了一个问题——监管的缺失。

拿孙锋来说,一个行长未经组织批准便赴泰国旅游,怎么就不能及时发现?还要等到两个多月后事情才浮出水面,那么他的上级又是怎么管理的?孙锋外逃之前,有外逃征兆。报道说,

孙锋的老婆夏琴突然辞职,孙锋炒期货亏损的消息,其妻的前领导也早就耳闻,那么孙锋的领导就一点也没有听到?孙锋有新加坡护照,不少地方有规定,领导干部的护照不得私自留存,需将证照上缴组织部门统一保管。由此可见监管的状况。

银行行长外逃已是屡见不鲜,但都没有看到这些外逃行长的领导为监管失职而付出代价。李华波外逃,负有领导责任的鄱阳县财政局长欧阳长青不仅被免去职务,还被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那么,孙锋的领导难道就没有责任? 洪巧俊

日前,国家发改委会同民政部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殡葬服务收费管理有关问题的指导意见》,《意见》将殡葬服务区分基本服务和延伸服务。《意见》要求,各地基本殡葬服务收费标准实行政府定价,殡葬延伸服务收费标准实行政府指导价。(3月24日《京华时报》)

一个人的生无非是“生老病死”,让老百姓生得起、死得起、老有所养、病有所医,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殡葬服务之所以久遭社会诟病,不仅在于其暴利,更在于其暴利建立在“发死人财”的基础上,违背了社会道德和习俗。因此,殡葬服务亟须规范,殡葬暴利亟待破除。

对于两部委联合发布的《意见》,我认为其最大亮点是将殡葬延伸服务纳入政府价格管理范围。众所周知,基本殡葬服务早已实行政府定价,有的地方甚至予以免费,但殡葬暴利依然难除,为何?问题就出在殡葬延伸服务上。遗体接送、存放、火化等基本服务实行政府定价或免费,而要享受这些价格优惠,就得到指定的殡仪馆办理丧事,既然来了,就得“顺便”接受殡仪馆提供的延伸服务——比如:既然殡仪馆将死者遗体运来存放,那么遗体整容等服务想必得交给殡仪馆;既然吊唁在殡仪馆举行,那么殡仪馆便更有底气将花圈、寿衣卖得贵一点、再贵一点……如此,基本殡葬服务的低价或免费,可能远远抵不上殡葬延伸服务的高收费,殡葬整体费用不降反升,老百姓更加“死不起”。

所以,只有将殡葬基本服务和延伸服务同时纳入政府价格监管,才有望破除殡葬暴利。两部委的《意见》要求各地对殡葬延伸服务实行政府指导价,将其限定在一定范围内浮动,可谓切中了问题的要害。

但是,切中问题要害未必就能解决问题,政府定价和指导价未必就是合理的价格,它们有时也“虚高”得让民众怨声载道。根据《意见》,基本殡葬服务价格“由各地价格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在成本监审或成本调查的基础上,考虑财政补贴情况,按照非营利原则从严核定”,这个规定看似很严谨,却漏掉了一个至关重要的环节,那就是征求民众意见,让民众参与价格决策。换言之,无论殡葬基本服务价格还是殡葬延伸服务价格,都应在成本公开的基础上召开价格听证会,由各方协商确定,而不能由各地价格部门、民政部门说了算。

《政府制定价格听证办法》第三条明确规定:“制定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公用事业价格、公益性服务价格和自然垄断经营的商品价格等政府指导价、政府定价,应当实行定价听证。”无论将殡葬服务价格定位为“公用事业价格、公益性服务价格”还是定位为“自然垄断经营的商品价格”,它无疑都是“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价格,既然实行政府定价和指导价,显然均应事先召开价格听证会。

鉴于目前一些地方的价格部门总是与垄断行业穿“连裆裤”,而民政部门又与殡葬行业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所以,制定殡葬服务价格切不可绕过“听证关”、“民意关”。或者说,只有政府定价和指导价具有较高的“民意含量”,才能挤干殡葬服务的价格“水分”,破除殡葬暴利,让老百姓“死得起”。 浦江潮

据《华西都市报》报道,近日有网友曝,四川达州计生局将一辆崭新的依维柯停着不用,一放就是两年,现在都快放烂了。达州计生局回应,因这辆车耗资大养不起,又没到批准的报废年限,只能等到报废期限再报废。

公车等着报废,在感性解读下,难免会被视作“资源浪费”的标本。好端端的公车,愣是束之高阁,任由它“覆满灰尘”,确实是种挥霍。公车配置无序、难以物尽其用,自然也被推到舆论的风口浪尖上。

而舆论对这辆“坐等报废”公车的关注,其实是对无数闲置公车的关注,公车改革再不提速,各级政府部门再不行动起来,不知道还有多少公车将“坐等报废”。

公车闲置,委实可惜。面对汹涌的质疑声,达州计生委很委屈:“养不起,只能等报废”;交警部门则表态:“未到报废年限,不能提前报废”是硬性规定。公理婆理,让责任界定一时有些模糊。

但“养不起”论调,支撑不起公车闲置的合理性。公车运行,向来需要成本。据权威调查显示,一辆公车一年的运行成本至少超6万。既然运行成本不菲,那缘何在公车配置时,授受双方你情我愿?就算公车配备“不差钱”,也应遵照“按需配置”“效用最大化”的原则;公车资源错置,只会靡费财力,加重财政负担。

公车闲置,揭示了公车配备结构的紊乱。达州计生局旧有公车仅有小毛驴,但四川省人口计生委又新配公车,以致下级部门“养不起”,其配置的依据何在?某种程度上,这揭示了现行供给制的积弊——这不透明的公车配置,因为不受外界监督,往往不是“按需而配”,而一旦浪费,也无纠正动力。

达州公车“坐等报废”是个案,却证明公车浪费何其严重。而这并非孤例,一些地方每遇重大活动,常有大量公车停运,而未见公务受其影响。这“多余”公车,为何宁等报废而不拍卖?让公车“瘦身”,就该大刀阔斧。当前应对各地公车使用情况进行全面普查,对过剩公车,不妨采取市场途径,比如拍卖或转拨方式让其退出。

今年两会期间,诸多代表委员聚焦公车改革,献策良方。近日,国务院转发改委《关于2012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意见》,“提出推进公务用车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适时出台中央和国家机关公务用车制度改革方案。

无论是公车“坐等报废”之现实,还是中央部门的政策指向,均昭示着公车改革的紧迫性。时至今日,许多地方公车改流于形式,沦为“盆景式改革”,不利于公车消费困境的纾解。公车改革需要循序渐进,但关键是要“真正行动起来”。尽管,公车改革需要方案,但是,在整体方案未出之前,削减、拍卖闲置公车完全可以先行一步。

殡葬服务政府定价不能绕过「民意关」

还有多少公车「坐等报废」